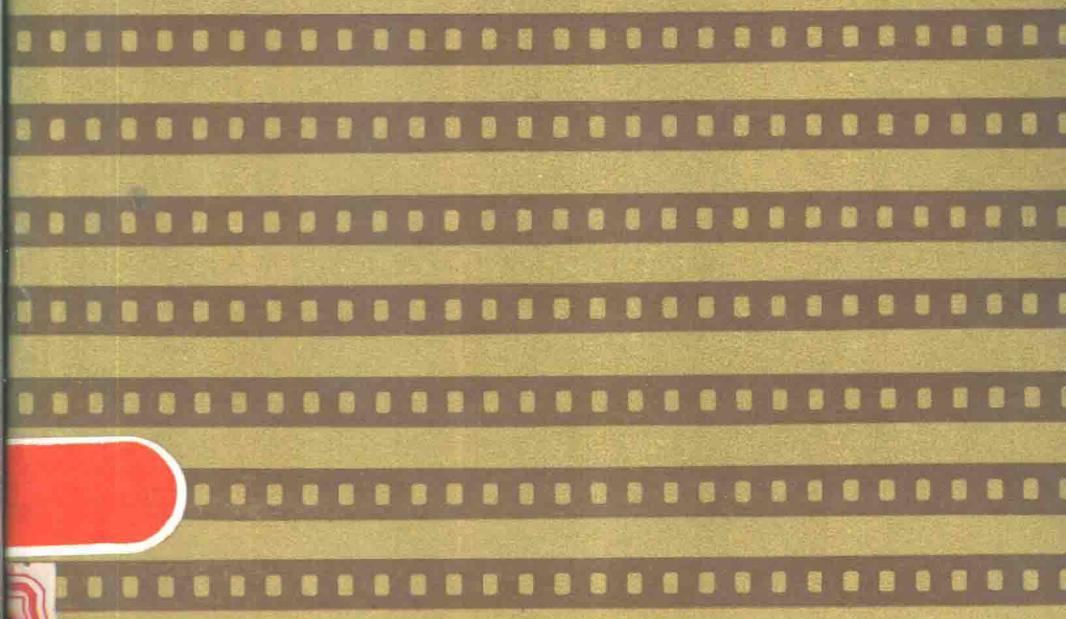


张骏祥 著

影事琐议

YINGSHISUOYI



中国电影出版社

影 事 琐 议

张 骏 祥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5 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辑录作者1977年以来发表在各报刊上的文章23篇，按时间顺序编排，收入本书时，作者略作删改。

这些文章多从全局的高度对三十年来我国电影事业的基本经验教训做了回顾和总结；同时以提高故事片思想艺术质量为中心，对电影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讨。

文章观点鲜明，针对性强，有说服力。

责任编辑：王家龙
封面设计：周小筠

影 事 琐 记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6 1/2 插页：4(精) 字数：162,000

1985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其中精装2,000 册)

统一书号：8061·2569

(平) 1.40
定价：(精) 2.30 元

目 次

应当重视电影的艺术理论研究	(1)
关于影片《白求恩大夫》	(6)
大力促进电影剧本创作	(14)
澄清是非 解放思想	(20)
掌握电影业务 提高剧本质量	(26)
解放思想 勤学苦练 努力把电影搞上去	(35)
佳果庆国寿	(44)
白求恩与电影	(58)
真该为刘少奇同志树碑立传	
——写在影片《燎原》重新上映的日子	(62)
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	(67)
老兵的喜悦	(89)
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吹	(92)
对电影的基本看法	(95)
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	(107)
读《独白》 怀白音	(116)
金鸡啼晓满园春	
——预祝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圆满成功	(124)
恐怕又是“老生常谈”	(126)
写于金鸡初唱时	(135)
《小街》新在哪里?	(142)
谈谈电影质量、电影文学、电影评论问题	(142)
近年欧美电影制作及其它	(158)
再谈电影文学与电影的文学价值	(174)
回顾是为了前进	(189)

应当重视电影的艺术理论研究

今天，整个科技战线意气风发，跃马扬鞭，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心尽快把科学研究搞上去，明确既要结合当前需要解决生产上的迫切问题，又要考虑长远需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令人十分鼓舞的喜讯。没有科学研究走在生产建设的前面，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很难想象的。

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很自然地想到电影也有个理论研究的任务。这里，我还不只是指在电影技术方面的问题。当然，无论摄影、录音、洗印等等方面，都亟待急起猛追，克服目前的落后现象，在各科学部门先进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电影技术的现代化。但是我在本文中想呼吁的，是对于电影艺术理论的研究工作的重视。（事实上，技术的现代化与艺术理论的研究也是息息相关的，工具的每项改革都必然地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段，从而促进艺术理论的发展。）

电影创作是艺术，但是探讨电影的艺术规律和美学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是一直重视不足的。今天在全国走向大治的大好形势下，正该动员起来，向科技界学习，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为了建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我国自己独特的电影体系和建立与此相适应的电影美学理论而努力奋斗。

解放以来，我们拍摄了不少影片，包括故事片、美术片、科教片、纪录片各片种。但是与此相适应的艺术经验总结和理论探

讨，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必讳言，我们在艺术表现手段上的停滞不前的缺陷，也是和这种对业务理论研究的忽视分不开的。应该说，由于有关同志们的努力，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例如中国电影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些优秀影片的创作经验总结，介绍翻译过一些国外电影理论的著作。当然，这些工作也有缺点，例如介绍外国电影理论的书，没有对这些理论作有力的分析批判，经验总结中也有些错误的观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刮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阴风，电影艺术理论研究的工作更完全陷于停顿，本来十分薄弱的一支队伍也被解散了！尤其严重的是，在“四人帮”的法西斯大棒之下，谁要是讲一句关于艺术规律、美学法则的话，就成了大逆不道，“复辟”、“回潮”……一顶顶的帽子就要扣下来！于是，在电影创作人员当中，谁都闭口不谈业务，更不要说钻研什么业务理论了。尤其令人愤恨的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却又搞什么“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条条框框，由他们任意扼杀革命文艺！

“四人帮”禁止人们谈科学理论，胡说什么“我们的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自然辩证法”，妄图诡辩地借口哲学，取消科学，对于文艺理论，当然更在严禁之列。事实上，毛主席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辉煌著作为无产阶级文艺指出了方向。毛主席又提出了繁荣无产阶级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创作方法上，毛主席指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这一切都为我们的文艺创作包括电影创作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电影工作人员就再不需要去钻研文艺创作特有的规律，再不需要去探讨电影表现的特殊手段了。恰恰相反，这些正是有待于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不断地从实践中去积累经验摸索探讨

为，电影的广阔性能使它成为对戏剧文学、叙事文学、抒情文学最能兼收并蓄的一种艺术形式。当然，不论叙事也罢，是抒情也罢，是展开戏剧冲突也罢，电影又都有它自己特殊表现方法，与文学创作、戏剧创作有所不同，而这又正是我们应该刻苦钻研的问题。

我们不仅要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传统，外国的文学艺术的、电影的成就我们也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借鉴。特别是苏联十月革命后电影方面的成就。那些年月，苏联的电影工作者勇敢地开辟社会主义电影的道路，拍摄了不少的好影片，同时也积累了不少好的创作经验。当然，这些经验也不都是适合于我们的，但是其中确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而且应该总结、借鉴甚至发扬。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和电影理论，我们也不应该采取闭目不看的办法。我们就是要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的理论中建立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电影理论。要批判就要懂得它，要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分析它的产生根源，然后批判才能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这样的批判才真正具有免疫力。

我们的电影也有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我们的电影和资本主义的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是一非，这里不存在什么赶超的问题。可是，在艺术上就有个粗细高低的问题存在。毛主席指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这些反动作品正是依靠它的艺术手腕来麻痹人民、毒害人民的。当然，一定的技巧总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我们绝不允许依样画葫芦地照搬这种艺术技巧。但是不能说这种东西就毫无可借鉴之处。至少，它可以促使我们努力在粗细高低上超过它。

我们深信，经过努力，一定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拍出大量的优秀的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影片，形成自己的独特的电影体系。但是，不能设想，没有相应的自己的电影艺术理论，就可以形成这样的体系。

电影理论研究工作也应该依靠群众，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动手。

的问题。毛主席早就在《讲话》中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在提出六项政治标准之后，又明确指出：“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什么是各种艺术的艺术标准，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标准呢？这正是要求艺术工作者探讨研究的课题。什么是电影的完美的形式，什么是评价一部影片的艺术标准，这正是要求电影工作者探讨研究的课题。

我们是实践论者，我们必须重视电影创作生产中的点滴经验。但是，我们又必须不断地总结这些经验，使它上升成为理论，然后又反过来，用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使我们的实践有所依据。只有这样，每个工作者的好经验才能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我们才可以避免走许多弯路。当然，经验、理论还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得到纠正，得到丰富提高，才能更趋于完整妥善。别人的经验通过自己的实践成为直接经验之后。又成为帮助别人同时又受新的检验的间接经验。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就是这样循环反复，不断趋向完善，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

说到间接经验，我们还不能忽视借鉴和继承古人和外国人的好经验，而且不仅仅是电影方面的经验。电影是综合艺术，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建筑……各个艺术部门的成就与我们有关，我们都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吸收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特别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形式，怎样运用到电影中来，这是有待于辛勤探索的大课题。例如：中国画法怎样运用到电影摄影、美工工作中来，民族音乐在电影中怎样运用，传统戏曲的表演方法能否吸收，有些方面已经作了初步探索试验，有些则根本还没有着手。应该说，这里还是许多有待开发的宝藏，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电影不仅是各种艺术的综合，同时又是文学创作。我个人认

我们希望电影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作曲以及各部门的工作者一起，随时随地总结自己在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互相交流启发。我们还可以发动大专院校文科教师和学生，发动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工农兵评论员，来从事电影艺术规律、美学原则的探讨。但是，同时，我们还必须逐步培养和建立一支专业的电影理论队伍和一支编辑、翻译的队伍。“四人帮”否定专业的流毒必须批判肃清。

在做法上，我认为应该一点一滴地从总结实践经验做起。不论是正面的收获、反面的教训，都应该鼓励随时总结下来，同时，应该有计划地组织编写编、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部门的基本教材，应该有计划地介绍国际间过去的和当前的各种电影理论，重要的可以翻译出版。出版时要有准确的分析和有说服力的评判。这些工作，开始时不怕比较粗浅，也要估计到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错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引导大家来评论批判，就可以逐步趋向完善。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由浅入深，由一得之见到比较完整的理论，逐步地建立起我们的电影美学体系。

（原载《人民电影》1977年第10期）

关于影片《白求恩大夫》

××同志：

承你问起《白求恩大夫》的创作经过，要我说说当时是怎样构思的、碰到些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我尽可能地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毕竟事隔十三年了，有些已经记不起了，只就些主要问题谈一谈吧。

《白求恩大夫》是我和赵拓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写成的。剧本原分五章，第一章写白求恩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事迹，事实上是个序幕，后面四章是主体，写的是白求恩来华后的活动。一九六四年春天拍成影片，由于国外部分拍摄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影片只拍了白求恩来华后这一部分。拍成之后，本来还准备作些修改，但是因为叛徒江青在一九六五年一月看了样片，说“这个题材根本不能拍。毛主席已经写了文章了，你们还想怎么样？”就这样，影片一直被搁置了起来。“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经过一些整理，影片终于在今年国庆同广大观众见面了。这就是《白求恩大夫》的遭遇的简略经过。

写白求恩传记的影片，主要任务当然是歌颂毛主席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指出的，这个伟大国际主义战士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歌颂他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要塑造好这个人物，就必须对白求恩的生平，从他一生的活动事迹，到他的个性、爱憎、著述、言论等等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我最初只读过周而复同志写的白求恩事迹片段以及后来他写的小说《白求恩大夫》。现在影片很多地方就是取材于这部小说。一九五八年伊文思同志提出中国应当拍摄白求恩传记影片的建议，我才比较深入地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关于白求恩的书籍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一九六二年，我和写过白求恩的电影剧本《永远不灭的光辉》的赵拓同志一起，沿着白求恩当年走过的部分路线作了一次旅行，到过延安，当年白求恩办的模范医院所在地和他的住处——五台山麓的松岩口和耿庄，在冀西山区和冀中平原，访问了见过白求恩的几位老乡，又访问过好多位曾和白求恩一道工作过、向他学习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听他们追忆当年白求恩的活动情况。这样，我对白求恩才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我也才真正懂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说白求恩是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说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的这种精神。

诺尔曼·白求恩是加拿大的著名胸腔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学会曾送给他荣誉会员的证书。他发明很多外科器械，因此享有专利权。白求恩把这张证书挂在厕所墙上，用这些钱在自己家里办了个儿童画校，培养一些有绘画才能的儿童。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扑灭当时在蒙特利尔蔓延的肺结核病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最需要治疗的人却得不到治疗，因为肺病在工人住的区域内最猖獗，而工人却没有能力付医药费用。他四出奔走，设法给工人搞免费医疗，但很快就发现这是“用杯水去救燃烧的罗马城”。他又联合了一些人呼吁搞所谓“社会医疗制”。就是要使医生成为政府工作人员，病人由政府负责治疗。在那个社会里，这当然是行不通的，白求恩到处碰壁，有些医师也认为这是亵渎了医师这个自由职业，埋怨说这是要把医师当成扫街的清道夫。白求恩的活动引起了各种责难和流言蜚语。对于他的外科技术，没有人不钦佩，但是对于他的为人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坦率，又有人说他傲慢，有人说他从不放宽自己，又有人骂他是沽名钓誉。甚至有

人给他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对于这些责难和流言蜚语，白求恩坚决地回答：“扑灭肺结核菌本来不是个医疗问题，而首先是个社会问题！”

白求恩失去了许多朋友，却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由于替工人治病，由于为免费医疗奔走，他接近了工人，并通过这些朋友接近了当时加拿大的共产党。他如饥似渴地读了列宁的著作。他接受邀请去列宁格勒参加了国际生理学大会。他终于懂得了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搞什么“社会医疗制”是枉费心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没法子搞植物嫁接的”他认识到只作一个征服肺结核的骑士是不行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制度问题。白求恩就是这样从一个人道主义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后来，他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那时，法西斯凶焰已经燃遍欧洲，希特勒、墨索里尼横行无忌，张伯伦、达拉第存心纵容，想把祸水引向东方。在西班牙，佛郎哥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挑起推翻民主政府的内战。在各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欧洲、美洲很多志士组成了国际纵队参加了马德里的保卫战。白求恩毅然率领了一个医疗队到了马德里前线。在那里，他目击了漆着黑字的德国轰炸机残酷屠杀手无寸铁的成千成万的难民。他默默地宣誓：“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扑灭法西斯而战斗！”后来，当他的同事劝他回医院搞专业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们不能制止这个法西斯瘟疫，我宁可把外科专业丢去喂狗”！

一九三七年白求恩回到美洲，在各大城市旅行演讲，为保卫马德里的战士捐募血浆。在旅途中，他看到中国八路军在河北、山西一带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抗击了长驱直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在当时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织了一个医疗队，远渡重洋，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到达我革命圣地延安，又提出到晋察冀根据地的要求。毛主席接见了他，问了他前线手术的作用，他说可以使伤员死亡率减低百分之七十五。·一九

三八年六月，白求恩通过封锁线，到了山西五台山区，先办了个模范医院，集中训练八路军医护人员。模范医院被毁后，他又组织了流动医疗队，活跃在河北、山西两省。先是在山区，后来又去了冀中平原，参加了许多重要战役。在黄土岭战役中作手术时白求恩割破了手指，不幸又在一次手术中受到感染，得了败血症，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白求恩逝世后，毛主席写了《纪念白求恩》这篇光辉著作，白求恩从此成为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学习典范，在国际间也成为万众景仰的国际主义战士。

请原谅我写了这么一大篇。我觉得这样你才能更了解我写这个剧本时的构思，同意为什么我总认为没有能拍出第一章白求恩来华前部分是多么大的一个遗憾。我怕没有这一部分，观众就不知道他是抱着多么强烈的对法西斯的憎恶和仇恨要到中国来，到晋察冀前线的。甚至会对影片中白求恩的某些行为不能深切理解，例如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方兆元作错了手术，会那样不留情面地责难这个八路军医生，在后来听到于部长介绍方兆元身世说到方兆元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刻苦学习时，又为什么那样感动，直到临终时还举着拳头作马德里式的敬礼，勉励大家“努力吧，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怕没有第一章这个序幕，没有看到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怎样地到处碰壁，“和许多人都处不好”，观众就不易深刻体会，他在欢送他回国的大会上说的“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给了我的最大的快乐”，以及他临时给司令员的信上说的“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是什么样的发自肺腑的话语。总之，我怕没有第一章这个序幕，观众就不能体会我是把后四章作为第一章的必然发展来思的，作为叙述一个共产党员如何走向更高的完善来处理的。

的确，在我着手进行这个剧本的构思的时候，我几乎认为自己是面临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白求恩是个反法西斯的战士，但是，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的武器是他的手术刀，他并不直接同日本侵略者面对面地斗争。他活动于其中的环境是我们的抗日根

据地，在他周围的是八路军医护人员和根据地军民。可是电影总得有戏剧矛盾。我既要歌颂白求恩，也要歌颂八路军；歌颂根据地人民。我曾对影片的摄制组说过，这个影片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白求恩，一个是根据地军民。但是，总不能把白求恩与根据地军民之间看成是没有矛盾的什么“无差别境界”啊！怎么办呢？按什么编剧法搞个什么人来作对立面吗？可是，既不能允许为了歌颂白求恩就贬低八路军人员，不能象后来“四人帮”胡说八道的什么“三突出”的办法，把白求恩写成天外飞来的神人一般的救世主，叫八路军人员只是跟着他转，把根据地军民作为只是对他的什么“陪衬”，另一方面，歌颂根据地军民又不能因此贬低白求恩，损害白求恩的形象。怎样能写出两者相得益彰，而又在二者之间展开戏剧的矛盾冲突呢？

我后来是试图这样解决的：在业务上白求恩帮助了八路军医务人员，根据地军民则以自己的行动使白求恩了解了八路军，了解了中国人民。白求恩确是帮助我们提高了医疗技术，树立了对伤员极端负责，对业务精益求精的榜样。影片也努力表现了这些。遗憾的是为了突出这一点，有些地方把根据地的医疗水平写得过于落后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有的同志提出这种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例如杨家庄的医疗站做截肢手术只有一把工兵锯子，例如说医疗队只剩了两磅石炭酸，不到一打的血管钳子。虽然我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才能使白求恩回国募捐的要求理由更充足，才能使后来白求恩得了败血症不治逝世时，不致引起对我们抢救不力的误解；但究竟还是有片面追求戏剧效果的因素存在。不过，我更想向你说明的，是关于白求恩对根据地军民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的问题。白求恩是抱着对法西斯的无比愤恨，抱着扑灭法西斯凶焰的强烈愿望，来帮助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神圣斗争的。但是在他面前有着不少必须克服的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对根据地的陌生，对八路军的不了解。一个外国人，来到一个连语言也不通的人民中间（这就是我坚持白求恩初到时

只会讲英语的理由)，要作到深刻理解这些和自己并肩战斗的同志，确实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初到根据地巡视了各医疗单位之后，以为困难只是“没有正规的医院，没有正规的手术室”和“缺乏有正规训练的医生”。他一片好心地办起个模范医院，结果却被窜到松岩口的日本侵略者一把火烧了！他不理解八路军里面象方兆元这样放牛娃出身的，“为了革命的需要”自己苦学作医生的人多得很，为方兆元作错了手术责备他，甚至拒绝他到训练班学习！他不了解平原上伤员可以在游击村的群众掩护之下平安无事照样得到治疗。这里有个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当他发现了办正规医院行不通的时候，他谴责自己不懂得这场战争没有绝对的前方后方，立即改变工作方式，成立流动医疗队。他为自己不收方兆元作检讨，主动提出要方兆元作自己的助手，后来方成了医疗队的政委。他承认方兆元在没有夹板时用秫秸秆代替是应该学习的方法。在平原上看到游击村对伤员的照顾，了解到农村小媳妇打扮的冯医生的身世之后，他夜不成寐，认为自己找到了为什么八路军能够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队的答案，激动地在日记上写下：“这是我的国土！这是我的人民！”我认为，这决没有贬低白求恩，反而正是突出了白求恩的高贵品质。白求恩正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克服了自己对根据地对八路军的不了解，才使自己能够如鱼得水地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白求恩是一个外国人，在一个连语言也不通的人民中间生了根，开了花。这是只有具备他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的人才能做得到的。毛主席在纪念文章中最后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这一句话正是影片企图表达的主题思想。

我不知道是否把自己的想法向你解释清楚了？总之，我是想告诉你：我写白求恩办模范医院，谴责方兆元，坚持要去大王庄，这不仅不是在贬低白求恩，相反地，也是在歌颂白求恩。在“四

人帮”那一套谬论的毒害之下，文艺创作中曾盛行一种图解方法，借口所谓“多侧面”，于是这一场景是表现人物这个侧面，那一细节是表现人物那个侧面的。好象塑造人物形象是可以象堆积木那样一个侧面一个侧面堆起来的！事实上，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对立统一物。我们当然要多方面地表现人物，但表现侧面的时候，应当同时也是表现整体。当我写白求恩听说血浆粉用完了，毫不迟疑地要抽自己的血输给徐连长的时候；写他风雪中行军一夜马上又去给没有多大希望的伤员作手术的时候，我是在歌颂白求恩，歌颂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就是在写他办模范医院，谴责方兆元、坚持去大王庄的时候，我仍然是在歌颂他，歌颂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因为正是出自他对法西斯的无比仇恨，出自他想使伤员得到治疗早日重上前线的愿望，他才要求办正规医院训练医生。他谴责方兆元是因为他做错了手术，因而不得不锯掉“一个反法西斯战士的腿”。抽自己的血给徐连长的是这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谴责方兆元的也是这同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白求恩。

如前所述，根据地军民也是这个戏的主角。因此，除了白求恩之外，剧本里还塑造了方兆元、徐连长、贾护士以及招呼白求恩的小勤务员和老炊事员等八路军和孟奶奶一家。这些角色戏有多有少，有轻有重。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经历，有其在剧中存在的价值。他们当然可以说是构成了白求恩活动于其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正他们绝不是照“四人帮”的谬论说的那种只是什么“一号人物”的“陪衬”。即使是大王庄那样一个只出现一场戏的冯医生，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轨迹，也是一个典型人物，也不是什么“陪衬”。白求恩在他自己的生活轨迹上偶然碰到了老冯，与她的生活轨迹上偶然交叉了一下，却在自己脑海中掀起了一个波澜，使他在日记上留下了那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自白。这怎么能说是什么“陪衬”呢？在所谓“陪衬”说的流毒下，有些作品往往信笔写了一个角色，给“一号人物”“陪衬”了一下，就丢

到一边无声无息了，接着又出来一个，“陪衬”一下又没有下文了。我觉得实在不足为训。当然，写白求恩与从方兆元到孟奶奶这些人物的交往，是为了给他说的自己在根据地十分快乐这句话作注脚。流动医疗队在深山野谷中高唱《游击队之歌》行进，白求恩在孟奶奶家过春节吃饺子是形象地证实他的快乐。但既是表现白求恩和根据地军民融洽无间，这种关系就是互相的，不是什么谁“陪衬”谁的问题。说到这里，又得告诉你遗憾的事了：就是一九六四年影片拍成之后，觉得还缺少一场白求恩和广大根据地军民在一起的戏，想在灵丘游击战之后增加一场军民联欢。后来影片搁置起来了就没有补拍。现在演白求恩的演员已经不在中国，想补拍也不成了。

有些同志看了影片之后，认为不必写到白求恩逝世。我有些不大同意。白求恩是在中国因病逝世的，这本无需回避。正是他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他临终还说自己“唯一的愿望是能多作些贡献”，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认为，只要英雄人物的死是激发起我们的斗志，引起我们向英雄人物学习的愿望，不是消极悲观，就没有理由说不能写英雄人物的死。遗憾的是，由于作为导演的我处理得不好，影片的结尾是嫌比较低沉了些。现在虽然尽量用配乐的旋律来作了一些补救，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你看，又是一个遗憾！

拉拉杂杂还是写了好几页。一则是因为你问起，二则是多年来实在憋得够呛。在“四人帮”的帽子棍子的威胁之下，除了天真易骗的人象着了梦魔似地跟着叫嚷什么“三突出”之外，谁都被迫学金人三缄其口。久矣夫无人肯谈文艺创作中的甘苦得失了。玉宇澄清万里埃。今天，经过了多年文化专制主义下的枯旱之后，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象甘露一样滋润了我们的心。话匣子不觉得一下子就打开了。错误在所难免，静候你的指正。

.....

(原载1977年11月4日《人民日报》)